

论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的中国想象

宋仕美

西北师范大学, 中国·甘肃 兰州 730070

【摘要】著名澳大利亚汉学家费子智在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中回忆了自己的旅华经历,其中国书写成为建构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,然而,他对中国的书写不可避免地受到东方主义话语的影响。本文旨在从风景、文化、人物三方面探讨费子智作为异国人的中国想象,反思其对中国的整体表述,同时分析费子智在书写中国时的东方主义倾向。

【关键词】费子智;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;东方主义;想象

费子智(C. P. Fitzgerald, 1902—1992)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澳大利亚汉学家之一。费子智一生致力于中国研究,作品包括《天之子》(Son of Heavens, 1933)、《五华楼》(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, 1941)、《中国文化史》(China: A Cultural History, 1953)、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(Why China?: Recollections of China, 1923—1950, 1985)等。这些作品涉及中国的历史、社会、文化、地理等方面,体现了费子智对中国全面深入的见解。

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是费子智的晚年回忆录,回忆了他从阅读中国历史,到亲自前往中国的经历,回答了自己从事中国研究的渊源。现有关于费子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《天之子》和《五华楼》,另有学者对其生平贡献进行梳理,然而,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这部完整呈现其中国记忆的作品,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。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,澳大利亚全面推广实行多元文化政策,受此影响,澳大利亚文坛出现了“亚洲写作”的潮流,其中也涌现了描写中国的作品,成为建构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费子智长期在中国生活,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对中国的书写已经不再是些许事实基础上的联想发挥,而是有相当的生活基础,作品中的中国书写值得探析。本文将以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为研究对象,拟从风景、文化、人物三方面探讨费子智作为异质文化者的中国想象。

一、费子智先后到达中国等地,描绘出广阔的中国风景画卷,展现了近代中国的自然与城市景观。1936年秋,他前往大理,对中国西南部的白族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,成果收入《五华楼》。费子智熟悉大理,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,他称大理的生活则“宛如一首田园诗”,具有一种“

没有遭到破坏的、无与伦比的自然美”,然而,费子智并未沉溺于西方田园式的审美幻想,将大理表征为乌托邦式的他者性空间。在大理长期居住,费子智对当地困境有着切身感受,交通不便、医疗不足等问题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,这使他意识到大理的发展需要。

然而,在中国之旅的初期,费子智到达上海,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。当费子智乘船行驶在黄浦江上时,他望见城区上空的浓烟,不由想到“每年冬季,在英国的第尔伯列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景象。”第二天,他走上街道,又觉得上海的建筑风格“不伦不类”,在他看来,“那是一种被淘汰了的、英国和欧洲古典建筑风格最坏的典型,充分反映了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那种低级的审美情趣。”费子智呈现了彼时上海作为“现代性窗口”的复杂图景,陌生的上海与其熟悉的英国形成对比。维柯曾指出,“每逢人们对远的未知的事物不能形成观念时,他们就根据见习的事物去对他们进行判断”。费子智笔下的上海是西方的模仿者,即追赶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他者,而非自主调适的主体。费子智在上海短暂停留,他对上海的观察是片面的,对这座城市也缺乏理解,他对上海的简单判断流露出其无意识的优越感,显示出东方主义的叙事特征。

二、费子智作为澳大利亚汉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,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研究,帮助澳洲大众认识、了解中国。形象学家莫哈认为,大多数人往往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,而是通过阅读作品或其他传媒来接受异国形象的。费子智对中国的迷恋始于少年时期,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阅读了《泰晤士报》(The Times)上由澳洲著名汉学家莫理循(G. E. Morison, 1862—1920)撰写的

张勋复辟的相关报道，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之后，费子智不停寻找与中国有关的书籍，但始终不能满足他的需要。费子智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描述是片面的，他对西方笔下的中国也深感怀疑，于是，他的理想逐渐明确，“我要前往中国，并且生活在那里，从事中国语言、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。”然而，在初涉中国前，费子智对中国的最初认识建立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之上，即使他亲赴异国，也已然不自觉地受到西方对中国集体想象的影响，“事实上，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脱离集体无意识的樊笼，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。”

费子智在中国断断续续居住了大概二十年的光阴，比起在信息和能力方面处于弱势的西方大众，费子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广泛、更深入，即便如此，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对中国文化的书写仍然具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话语特征。在描写汉口码头的工人时，提及他们在劳作时哼唱的号子。费子智对劳动号子不甚了解，只能形容这是“两个字的”以及“很有韵律”，随后又情不自禁地将其与“苦难”联系在一起，未免过于武断，明显忽略了劳动号子作为集体劳动节奏调节手段、情绪表达方式乃至文化象征的多重功能，反映出一种“预设式的理解”。

巴柔曾指出，在个人、集体、半集体这些形象创造者的层面上，“‘他者’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‘他者’的否定，而对‘我’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。这个‘我’要说‘他者……但在言说‘他者’的同时，这个‘我’却趋向于否定他者，从而言说了自我”。显然，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对中国文化的书写依然具有简单化、扁平化的特征，使之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集体想象的投射物，陷入千篇一律的固定表现模式。

三、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对中国人形象的书写，并非单纯的对异国形象的刻画，也与构建自我身份有关。法国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学者巴柔在定义“形象”时指出“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‘他者’，本土与‘异域’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，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。”未涉足中国前，费子智认为不少西方作品对中国的评价带有偏见，然而，“作者也不能以同样鲜明而确切的事实使他们那种

评价自圆其说。”他期望自己能塑造更客观真实的中国人形象，然而，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仍然难以摆脱将中国视为“他者”的东方主义叙事意识。

在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中，费子智在上海与中国工人一起劳动，他觉得“对任何一个外国人来说，与中国人一起劳动远非一件体面的事。”这正是东方主义叙事意识作祟。费子智还回忆了工作的某天，他乘黄包车去上班，车夫爬过陡桥时，“低着头、弯着腰”，与一位载中国太太的车夫相撞，他粗野地骂起对方的车夫，因此被太太敲打斥责，陷入沉默。这看似随意的回忆片段无疑是选择性的，费子智笔下的中国车夫愚昧而顺从，需要被“文明化”，其形象刻画无不显示出东方话语运作的痕迹。

费子智作为异质文化者，在实际接触大量中国素材时，需要从中有意识地进行取舍，有选择性地描写刻画，而所讲的人和事又可能被当作典型来接受。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中看似偶然的中国意象，背后有着西方关于中国的集体想象，如萨义德所指出的，西方世界常把东方社会本质化、停滞化，通过刻板印象来构建服务自身的“东方观”。因此，我们在阅读《我在中国的岁月》时，也需要警惕费子智在书写中国时的东方主义倾向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樊琳. 费子智和他的中国梦[J]. 国际汉学, 2015, (03): 99-101.
- [2] 胡再德. 费子智教授的中国学研究[J]. 国际汉学, 2013, (01): 131-140.
- [3] 王小英. 论新世纪美国非虚构小说的中国叙事[J]. 当代外国文学, 2020, (04): 44-51.
- [4] 萨义德. 东方学[M]. 王宇根译. 北京: 三联书店, 2007.
- [5] 萨义德. 文化与帝国主义[M]. 王宇根译. 北京: 三联书店, 2003.
- [6] 欧阳显. 表现他者: 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 1888—1988[M].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0.
- [7] 孟华. 比较文学形象学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1.